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蒙，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高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外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文化的进程中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前言

一、《大唐西域记》的作者问题

《大唐西域记》是唐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历十七年，经百余国，凡五万余里的游记。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到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内许多国家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并有不少佛教故事传说。此书早在古代，就已成为名著；降及近现代，更是蜚声士林，在国内、国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名著，其作者却至今未被完全肯定，——至少未被学术界一致公认——这是颇为遗憾的事。所以，在此首先要谈一谈《大唐西域记》的作者问题。

如今所见到的《大唐西域记》的印本，自北宋本以下，每卷卷首的作者题名，都分列成这样两行：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

这一题名款式十分特殊，也很难理解。似乎此书乃玄奘译自梵文；但是为何同时又称辩机撰写？现代有的研究专著则将玄奘和辩机都视为作者（例如，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封面署为“玄奘辩机原著”），似乎也不确切。我赞成将玄奘看成作者，而辩机只是加以润色和编排的观点。兹申述理由如下：

清朝乾隆年间，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西域记》条下指出：“旧方伎传，僧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考石刻太宗御制《圣教序》，及高宗为太子时制《述圣记》，宏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书，并钱希白《南部新书》辛卷所载，与旧书略同。《玉海》第六卷云：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译，辩机撰。今佛藏有此，卷首并列二僧名。据《旧唐书》云云，则玄奘所译乃佛经。此书玄奘自撰，何译之有？辩机恶僧，岂能著书？《玉海》非是，藏本承其误耳。”王氏谓辩机恶僧，不能著书（辩机守身不正，曾与高阳公主私通，事泄后，被太宗腰斩），此言固然不合逻辑；但是他清楚指出辩机并非《大唐西域记》的



作者,则颇有根据和见地。事实上,唐代的许多著述中都声称此书乃玄奘所撰。例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七月十三日,玄奘在其所上的《进西域记表》中说道:“至于玄奘所记,微为详尽,其迂辞玮说,多从翦弃,缀为《大唐西域记》一十二卷,缮写如别。”道世在其撰成于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的《法苑珠林》卷一百《杂集部》记云:“《大唐西域传》十三卷,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敕撰。”又,慧琳在其成于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初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二清楚标明,《大唐西域记》乃是“三藏沙门玄奘奉敕撰”。其他如《开元释教录》《贞元释教录》等唐代佛教典籍也都只称《大唐西域记》为玄奘所撰,而不称玄奘译,并绝不提及辩机的名字。由此可知,所谓“辩机撰”的题款,只是宋代及其以后的事情。

为什么宋代会将辩机误解成《大唐西域记》的作者?贺昌群在其《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唐代道宣所著《大唐内典录》卷五列出玄奘所译大、小乘经论六十七部,最末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总称“京师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诏译”(未提辩机之名);显然,这种题款极易使人将《大唐西域记》也归入玄奘翻译的佛经之列,遂启后世称《西域记》为玄奘所译之端。此后,宋太祖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开雕蜀板藏经,既误据《内典录》之题款,又因辩机《记赞》中有“爰命庸才,撰斯方志”一语,遂题成“辩机撰”。后世因袭之,致有此误。这一解释言之成理,很可能符合——或者至少接近——事实。

至于辩机在《大唐西域记》的成书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周连宽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见周连宽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附录一”):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辩机整理玄奘所得材料而成书。《记赞》中“恭承志记,伦次其文”一语表明,玄奘交给辩机的原稿,很可能已是《志记》,辩机不过加以编次排比而已。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云:“(玄奘)微有余隙,又出《西域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缀前后。”这实际上正是道宣为自己《大唐内典录》中《西域记》条下所作的注解。当时道宣是玄奘译经的助手之一,其言可信。所以,“沙门辩机,亲受时事”当理解为:辩机接受玄奘游历各国所记当时的事情;“连缀前后”,则应理解为:辩机把玄奘原稿的内容连贯排比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著作。有鉴于此,应该把现行《大唐

西域记》的著录款式改正为“唐释玄奘撰辩机编次”。

二、玄奘的生平

在叙述玄奘的生平事迹之前，有两个关键的时间问题必须首先予以澄清，即，玄奘的诞生年份或其年寿问题，以及玄奘出发西行的年份问题。显然，这两个时间关系到玄奘一生中其他重大活动的时间，不能随便忽略。

（一）玄奘的生平年份

玄奘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但是，对于他的年寿，唐人的传记、行状、塔铭、经录等等，说法互异；即使在同一篇文章内，其前后年岁的记载也自相矛盾。所以这一问题迄于现代仍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在唐人的记载中，对于玄奘卒于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初五夜半，并无异辞；但是，由此逆推其出生年份与年寿，则有不少说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甲、六十三岁说 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约成于玄奘逝世的同年四月间）记云：“麟德元年，……（玄奘）谓弟子及翻经僧等：‘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之质，何得久停。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华。若于经论有疑，宜即速问，勿为后悔。’”由此逆推，则玄奘应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对于此说，有不少中外学者赞同之。例如，陈垣《释氏疑年录》及《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刘汝霖《唐玄奘法师年谱》，朱东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田光烈《玄奘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堀谦德《解说西域记》，前岛信次《玄奘三藏》等全都持这一观点。

乙、六十五岁说 道宣《续高僧传》（成于玄奘逝世的翌年）卷四《玄奘传》记云：“麟德元年，（玄奘）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有五矣，必卒玉华。于经论有疑者，可速问。’”由此逆推，则玄奘应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陈思《唐玄奘法师年谱》，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吕澂《玄奘法师传略》，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四研究》，望月信亨《望月佛教大事年表》等均从此说。

丙、六十九岁说 慧立原著，彦棕笺补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成于玄奘逝世后的第二十四年，即武后垂拱四年）卷十却载云：“至（显庆）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经》。……（玄奘）谓诸僧曰：



“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据此，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时玄奘已经六十五岁，则其诞生年份当为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亦即是说，玄奘应当享年六十九岁。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苏渊雷《玄奘》、向达《玄奘法师》等均持此说。

以上三种说法所自的原始资料中，《慈恩传》成书时间最晚，并且先由慧立写成五卷，后由彦惊竭力搜购早先流散的五卷，再加补充整理，才成现在的十卷；所以其权威性不及前二者。换言之，六十九岁说恐怕有误。至于前二种说法相比较，《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史学家，其记载应当更为严谨；此外，有更多的原始资料证实《续高僧传》之说，所以，可能六十五岁说更为接近事实。杨廷福亦持六十五岁说（见杨廷福著《玄奘论集》“玄奘年寿考论”篇），并具体地论述之。其主要论据可以概括如下：

甲、六十五岁之说始于道宣的《续高僧传》。而道宣则是玄奘的同辈人（生于公元596年）；并自玄奘开始在弘福寺译经之时，就在译场掌经文，后又在西明寺充上座，与玄奘一起译经，直至玄奘去世，道宣几乎始终在京师。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故按常情而论，以道宣这样的身份，不至于搞错玄奘的年寿。

乙、道宣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以《续高僧传》为例，他力求查明所传者的生卒年月，凡不可考见，均付之阙疑；而书中又以《玄奘传》用力最勤，篇幅最长，故玄奘之年岁不应有误。此外，玄奘逝世，高宗为之罢朝，“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数百千”（语见《慈恩传》卷十）；而当时道宣正在长安，不久后即成《续高僧传》。按此背景推测，难道道宣还会不知玄奘的正确年岁？

丙、《慈恩传》和《塔铭》均谓玄奘十三岁在东都蒙大理卿郑善果的器识，始得引渡出家。按玄奘享年六十五岁计算，是年为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而据《隋书·炀帝纪》《樊子盖传》《裴矩传》《旧唐书·郑善果传》等，郑善果于大业八年恰好在大理卿任上。这为六十五岁说又添一证。

丁、《慈恩传》卷九所载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玄奘之《请入少林寺表》中有“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句。按词义训释，“飒焉已至”乃是“倏然将临”之意；而若以玄奘享年六十五岁计，显庆二年为

五十八岁,与“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之辞完全吻合。反之,与其他年寿说均相矛盾。

戊、旧抄本《重请入山表》当是玄奘手笔,其中说道:“沙门玄奘言。……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心绪迷谬,非复平常,朽疾相仍,前途诘几。”玄奘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开始译经,上表时为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其间恰为十五年;是年玄奘既然自称六十岁,则他去世时(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为六十五岁可无疑问。

(二)玄奘西游的首途年份

关于玄奘西行首途的年份,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贞观元年说、二年说、三年说。梁启超提出四证,首创元年说(见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佛学研究十八篇》附录三、《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等);其后冯承钧、刘汝霖、曾了若、黄忏华、向达、任继愈、田光烈、杨廷福,以及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均从之。丁谦则主二年说:“唐太宗贞观二年,东都僧玄奘遍游五印度,至贞观十九年返,前后凡十七年。”(见丁谦著《大唐西域记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吕澂及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都曾经赞成此说。陈垣竭力主张三年说(见陈垣著《书内学院新校本慈恩传后》);嗣后,研究中国哲学史、佛教史与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如陈思、张星煌、蒋维乔、周叔迦、朱东润、苏渊雷等均从同之。

近年来,一篇很有说明力的文章是杨廷福的《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释》。他通过五个方面的探讨,得出玄奘在贞观元年八月西行首途的结论。这五个论据是:

甲、玄奘译竣《菩萨藏经》后与《西域记》同时奏上的《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载《广弘明集》卷二十二)说道:“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总获六百五十七部。”故其他典籍之所以作“三年”,很可能是因为“元”、“三”两字形近而产生传抄之误。

乙、西突厥可汗统叶护确实死于贞观二年;所以玄奘只有在贞观元年启程,才有可能在二年初夏抵达素叶城,与统叶护可汗晤面。

丙、有人认为玄奘会见的突厥可汗乃是统叶护之子肆叶护,而非统叶护本人。实际上,种种史料都表明,玄奘所会见的确是统叶护,而非肆叶护。因此,玄奘不可能在贞观三年首途。

丁、玄奘抵达高昌后，高昌王麹文泰礼敬备至，与玄奘结为兄弟，再三挽留；玄奘在那里也确实逗留了好长一段时间。然而，按《通鉴》所记，贞观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麹文泰曾经入朝唐廷。因此，按时间推算，玄奘只有于贞观元年首途西行，才来得及在高昌与麹文泰相聚许多时日；若于贞观三年动身，则高昌王不可能在离国赴中原之前与玄奘久聚，甚至二人在中途交错而过也未可知。

戊、各种史料均谓玄奘往返西域达十七年。仔细统计玄奘的行程以及在各地淹留的时间，确实需要十七足年。玄奘在返程中曾被于闐王挽留，未能立即回到中原，故曾修表遣人先送朝廷，其表文有“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之语；而当时正值贞观十八年。所以，玄奘唯有在贞观元年首途，才可能使用这一措辞；若在贞观三年启程西行，无论如何谈不上“历览周游，一十七载”。

（三）玄奘的生平事略

玄奘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出生于陈姓之家。相传其远祖是后汉时颍川郡许县（今河南许昌县东）人陈仲弓。玄奘以上四代为官，高祖名湛，任北魏清河太守；曾祖名山，任北魏征东将军、南阳郡开国公；祖父名康，北齐国子博士，转司业，又转礼部侍郎，始移居洛阳附近，后成为缙氏县（今河南偃师县南）人；父名惠，曾任陈留县令、江陵县令。玄奘之二哥名素，出家后改名长捷，也是一位著名的僧人。

玄奘自小勤奋好学，得其二兄长捷的直接指导，对于佛学更是爱好。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他得大理卿郑善果的特别赏识，在洛阳出家，时年方十三。玄奘十九岁时（公元618年），离开洛阳，前赴长安；旋即经汉中一带南入成都，在此逗留较久（约公元619—622年），听道基、宝暹等讲法，数年之间，熟习佛教各部学说。玄奘并在成都受具足戒，成为完全的僧人，时当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此后，他又赴荆州、相州、赵州等地求学，然后约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年底返回长安，住大觉寺；并就道岳、法常、玄会等学《俱舍论》等佛经。所以，玄奘在西行之前，已在国内就学于十三位佛家名师，几乎尽通中国之佛学。

玄奘越来越不满足于中国佛学的紊乱状况，有许多问题均未得到彻底解决；同时又受来自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朋友的影响，遂决心前

往印度直接探索佛学的堂奥,并取《瑜伽师地论》。当他终于踏上西行的征途时,已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玄奘取道如今的甘肃、新疆,历经西域诸国,行程数万里,遭遇了种种艰难险阻,才到达了北印度;在北印度又经十余国,始抵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时当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月初,玄奘三十二岁。此时那烂陀寺的主持是著名高僧戒贤大师;据说戒贤已经一百多岁,是为了等候玄奘才继续留在人世。戒贤对玄奘异常器重,特遣四位长老、二百余僧、千余施主迎接玄奘进入那烂陀寺。玄奘在那烂陀寺求学、研究,前后共达五年。在那里听戒贤大师讲授《瑜伽师地论》共三遍,又听《顺正理》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各二遍、《中论》《百论》各三遍;同时又学婆罗门教经典及梵书,对印度的语言也下了一番功夫,为归国后的翻译事业莫下了良好的基础。

玄奘旅印期间,还去其他各地游学,拜访不少名师,参观许多古迹,获得了广博的知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辞别当时北印度的雄主戒日王,启程回国,时年四十二岁。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倍途而进”,于二十四日行抵长安西郊漕上,由于民众奔凑观礼,前进不得,只能留宿于此。房玄龄遣右武威大将军侯莫陈实等前往迎接;玄奘遂于二十五日进入长安城。玄奘从印度带归中国的,除了一些如来舍利和佛像外,尚有佛教的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计六百五十七部,用二十四马驮载。

同年二月,玄奘应召前往洛阳行宫晋见太宗;嗣后即奉诏回长安弘福寺组织规模弘大的佛经译场,开始翻译事业。玄奘从贞观十九年五月,一直到麟德元年正月,即他逝世前一个月,差不多整整十九年的时间内,都在率领学问僧们勤勤恳恳地从事译经工作。《慈恩传》卷七描述玄奘的日常生活道:“自此以后,专务翻译,无弃分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撮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在这十九年间,玄奘除了有时奉诏入宫伴随皇室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的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以及长安以北的玉华宫寺进行翻译。由他主持翻译出来的佛教经籍,共计七十五部,一千三



百三十五卷。不但数量巨大,质量也臻上乘。

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半,玄奘法师在玉华宫寺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五岁。消息传到长安,文武百官以及僧俗人等莫不悲悼,高宗为之罢朝数日。四月十四日,遵照玄奘遗嘱,葬于浐水之滨白鹿原,五百里内执拂者不计其数。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有敕迁葬玄奘于樊川北原,营建塔宇。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敕在东、西两京各建一佛光寺,追谥玄奘为大遍觉法师。

三、《大唐西域记》的主要成就和特色

《大唐西域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它不但使中国地理学达到空前的水平,对于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地理学也是巨大的贡献。在玄奘之前,虽然早有不少地理著作,但是它们不是夹杂着许多神话传说成分(例如《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就是叙述范围较小(例如《法显传》《惠生行传》等)。玄奘西行的时代,在中国方面,正值唐代一统天下,声威逐渐远播之时,所以在今新疆境内等地的旅行颇为顺利;此时西突厥政权在中亚等地的“强制和平”又有助于他在该地区的活动;至于北印度,也恰值笈婆佛教的戒日王雄霸之时,这大大有利于玄奘在那里的求学和旅行。玄奘因此得以比较顺利地通过各国,从而比较具体地记载各地的地理状况。玄奘回国以后,唐太宗出于“扬威四海”的强烈愿望,迫切希望玄奘迅速写出此书。这是《大唐西域记》的内容较诸以前各种地理书更为详细,更为真实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唐西域记》所记述的国家达一百三十八个以上,分布的范围则以中亚、南亚为主,兼及西亚、小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亲履之地,大多数地理、交通描绘都真实可信,所载佛教古迹也多凿凿有据,不少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所以,即使仅就古代地理学而言,《大唐西域记》也完全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历史方面,即是在印度历史、印度佛教史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巨大史料价值。古代印度人在哲学、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却缺乏历史观念,没有给后人留下一部翔实的史籍。马克思也曾慨叹:“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见其《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因此,玄奘的这一著作,被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们公认为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印度史学家辛哈、班纳吉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玄奘,给

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国的历史资料,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见他们合著的《印度通史》)英国的著名印度史学家史密斯也曾说:“对于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见 V. A. 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大唐西域记》对于印度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所记述。例如,关于伟大的语法学家波你尼,关于毗卢择迦王讨伐诸释,关于阿育王与太子拘浪拿的故事等等;至于对贵霜王朝雄主迦腻色迦,公元7世纪上半叶北印度统治者戒日王等人的描述则更为详细。关于佛教史,《大唐西域记》中的材料还要多。佛教史上几次著名的集结,除了南传佛教承认的阿育王集结外,其他都有记载;大乘佛教中许多大师,如马鸣、龙猛(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人的活动情况,书中也有不少描述。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记》中还谈到了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而这对于印度历史之年代的确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尚有其他汉文史籍也谈及了这个问题);释迦的生卒年份确定后,此前和此后的大事年代才有可靠的依据,才能真正谈到历史。有的史学家形象地说,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闪光的柱子,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

《大唐西域记》不仅解决了其他史籍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关于印度当时之政治、经济状况、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宗教力量之对比、关于佛教之集结、关于小乘部派之分布情况等等),还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季羨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前言》中指出,玄奘提及的各国的语言情况,至今尚未完全获得证实,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死敌,他与释迦在当年的斗争,对于后世大乘佛教之教义和发展有否关系?这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玄奘所记印度的若干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有待于继续深入地搞清楚。

以上只是简要地提及了《大唐西域记》的主要价值,其实际贡献远远不止这些。它不但拓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以及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并且还对中国日后的文化艺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由《大唐西域记》敷衍而成的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便是生动的一例。真正能够流芳百世、永垂千古的作品,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依靠人为的吹嘘。

本书的原文以章巽师校点的《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为底本;参考季羨林先生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85年),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正,若干标点也有改动,但是不再一一指出。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始终得到恩师章巽教授的直接指导,并且获得参考资料方面的最有力支持;同时,对于季羨林先生等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也多所参考;又,挚友余太山先生曾对本书提过极为有益的建议。为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在前辈学者和同行们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本书。虽然有所创见和发明,但是囿于水平,肯定仍有许多不足,乃至谬误之处,谨请方家不吝赐教。

芮传明

1993年元月

序

【题解】

本序由敬播所撰。敬播为蒲州河东人，于贞观初擢为进士。曾参与颜师古和孔颖达的隋史编纂工作；与令狐德棻等人合撰《晋书》；以及与许敬宗合撰《高宗实录》《太宗实录》。房玄龄曾称他为“陈寿之流”，并因颜师古注《汉书》过繁，令敬播撰其要为四十篇。敬播历任著作佐郎、太子司议郎、谏议大夫、给事中。后坐事出为越州长史，徙安州刺史而卒。本序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了历代以来中原王朝与域外的交通，但是强调指出，大唐以前从未翔实而深入地介绍过天竺的佛学和经文，唯有本朝才完成了这一伟大事业。第二部分则简述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过程，以及他在将佛经引入中原，使中原人了解域外状况方面的巨大贡献。

【原文】 §1.1

窃以穹仪方载之广，蕴识怀灵之异，《谈天》无以究其极^①，《括地》
① 诂足辩其原^②？是知方志所未传，声教所不暨者，岂可胜道哉^③！
② 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④。圣贤以之叠轶，仁义于焉成俗^⑤。
③ 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⑥，《王会》所不书^⑦。
④ 博望凿空，徒真怀于邛竹；昆明道闭，遽肆力于神池^⑧。
⑤ 遽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⑨；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⑩。
⑥ 暨于蔡愔访道，摩腾入洛，经藏石室，未尽龙宫之奥，像画凉台^⑪，
⑦ 宁极鹭峰之美^⑫。自兹厥后，时政多虞。闾竖称权，愤东京而鼎峙；
⑧ 母后成衅，剪中朝而幅裂。宪章泯于函、雒，烽燧警于关塞，
⑨ 四郊因而多垒，况兹邦之绝远哉^⑬！然而钓奇之客，希世间至。
⑩ 颇存记注，宁尽物土之宜；徒采《神经》^⑭，未及真如之旨^⑮。
⑪ 有隋一统，实务恢疆，尚且眷西海而咨嗟^⑯，望东离而杼轴^⑰。
⑫ 扬旌玉门之表，信亦多人^⑱；利涉葱岭之源，盖无足纪^⑲。
⑬ 曷能指雪山而长鹭，望龙池而一息者哉^⑳！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远。
⑭ 我大唐之有天下也，辟寰宇而创帝图，扫揜抢而清天步^㉑。
⑮ 功侔造化，明等照临。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锡寿，还魂鬼魅之墟。
⑯ 总异类于薰街，掩

遐荒于舆地^②。苑十洲而池环海^③，小五帝而鄙上皇^④。

注释

①战国时代的齐人驺衍之术迂大而阔辩，故国人号为“谈天衍”；其书则称为《谈天》。刘向《别录》：“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书言天事，故曰《谈天》。”

②《括地》：当是大禹所得之地理书《括地象图》的简称。《尚书·纬刑·德放》：“禹长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图》，故以为司空。”《周礼·春官·保章氏》贾公彦疏引作《括地象》。又，唐初魏王泰曾命萧德衍、顾胤等辑《括地志》；但玄奘在此所称的《括地》恐怕不是指该书。

③“方志”当即“地志”，乃是记载地理沿革之史志的泛称；由于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称地为“方州”，遂产生“方志”一名。此名常与同为泛称的“山经”并提，韩愈《南山》诗云：“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固。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山经及地志，茫昧非受授。”

④天竺，亦作天写、天誓、天毒、身毒等，今印度之古名。《括地志》云：“天竺国有东、西、南、北、中央五国，即今五印度也。”关于五印度，见卷二，§1.2，注①。

⑤叠：义为重复、数量多。辚：原义为车厢底部四面之横木，戴震《考工记图》：“舆下四面材合而收舆谓之辚，亦谓之收。”本文“辚”则为车的代称，《后汉书·左雄、周举、黄琼传论》：“往车虽折，而来辚方道。”则此地“叠辚”形容车马频繁，比喻天竺不断涌现圣贤之士。

⑥《山经》：在此恐怕不是特指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山海经》的作者和时代迄今未成定说，最早可上溯至禹、益，《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逆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而是对所有地理著述的泛称；犹如本节注^⑤所言，“山经”常与“方志”并提，泛指地志。《宋史·刘敞传》：“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如大略。”显然“山经”为同一类书的统称。

⑦《王会》：乃先秦古籍《逸周书》中的一篇，记载四方诸侯入朝的盛况。《逸周书》多记周初事迹，连序在内，共计七十一篇。

⑧按《汉书·张骞传》：张骞在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数度出使西域，是为中原王朝与西域进行官方交往之始，故称此举为“凿空”（开通之义）。他于元朔六年（前123年）被封为博望侯。张骞在大夏国（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当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曾见转输自印度的邛山（位于今四川荣经县西南）竹杖，因而断定蜀中有交通道可通印度，遂建议武帝经略西南。然而汉使至昆明受阻，终未能通。又据《汉书·武帝本纪》，武帝曾于元狩三年（前120

年)发遣吏在长安西南挖掘昆明池。周回四十里,模拟昆明国之滇池。用以操习水战,旨在日后征讨阻隔汉使的昆明国。本文的“神池”即是指此昆明池。

⑤上天为预告或赞叹将要出现的善事,便有不可思议之现象产生,这就称为祥瑞。佛陀降诞之时,出现包括星辰在内的种种祥瑞,故本文称“瑞表恒星”。《法苑珠林》卷八《千佛篇·降胎部》详引诸经所载释迦牟尼诞生时的祥瑞,其中有不少是星辰示现的吉兆。例如,《因果经》云:“尔时菩萨欲降母胎,即乘六牙白象,发兜率宫,无量诸天作诸伎乐,烧众名香,散天妙花,随菩萨满虚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二月八日,夫人往毗蓝尼兰,见无忧花,举右手摘,(释迦牟尼)从右脇出。今谓世代既遥,译人前后直就经文,难可论辩考求,外典如似可见。《春秋》云,鲁庄公七年,即庄王一十年,四月辛亥,恒星不见,星殒如雨。检内外,以四月为正也。”《普曜经》云:“(释迦牟尼)太子于十月已临产之时,先现瑞应三十有二。……十九,佛宿下侍,诸星卫从;……”

据说,释迦出世于周昭王二十四年,涅槃于周穆王五十二年。按此计算,则从释迦去世到东汉明帝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关于佛教传人之始,见下文各注)时,正好经过千年,与《周书异记》“周昭王时有圣人出自西方。太史苏由对曰:‘所记一千年时,声教被及此土。’”之语吻合,故本文有“郁(遮蔽,阻隔之义)玄妙于千载”之说。

⑥梦影佩日:典出汉明帝梦见身绕日光之神的故事。牟子《理感论》二十章叙述中原始闻佛道之事:“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明帝(公元57—71年)遂遣使西域,抄写佛经。佛教于是传入中原。本文中的“影”义为明、光明;“佩”义为环绕,《水经注·鲍丘水注》:“鲍丘水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诸泽,渺望无限也。”

⑦牟子《理感论》、袁宏《后汉纪》、范曄《后汉书》等均仅言明帝梦神人后遣使西域,而未载蔡愔得佛像与沙门回国之事。此事首见于王琰《冥祥记》:“初,使者蔡愔得西域迦叶摩腾等贡优填王书,释迦佛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马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冥祥记》所志诡异,这条记载本不可信(汤用彤认为:“蔡愔、摩腾故事,显为更晚出之事实。刘宋以前既不见于正史,又为佛家所未称述,则其说之不可信,益可知矣。”(见汤氏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页),但是后世却公认为求法史实。《高僧传·摄摩腾传》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城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同书《兴福篇》之论曰:“蔡愔、秦景自西域还至,始传画纸释迦,于是凉台、寿陵并图其像。”本文“蔡愔访道”、“摩腾人洛”、“经藏石室”、“像画凉台”诸语均因自这类传说。

⑫灵鹫峰：即灵鹫山，亦简称灵山，梵名耆闍崛。山形似鹫头，又以山中多鹫，故名。在中印度国上茅城附近。如来曾在这里演讲《法华经》等。佛家以此山为圣地，故中国的各“灵鹫山”、“灵山”（例如，浙江杭州西湖之畔，福建福清县之北，广东曲江之北等地都有这类名称的山）均源出佛教传说。本书卷九“摩揭陀国”条叙述此山较详。

⑬自和帝（公元88—105年）开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东汉渐趋衰败。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以窦宪为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窦宪诸弟也都居亲要之职。窦氏横行京师，和帝与臣僚隔绝，只能依靠贴身宦官。遂于永平四年（公元92年）以宦官郑众之禁军消灭窦氏势力。安帝（公元106—125年）时，邓太后与其弟邓骘掌握实权。此后，安帝借助宦官李闰、江京，清除邓氏；宦官遂执大权。顺帝（公元125—144年）扶植外戚，相继拜后父梁冀及其子梁骘为大将军；导致身后梁太后与梁骘先后选立冲、质、植三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后，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消灭梁氏；嗣后，则宦官独揽大权，“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语见《后汉书·朱穆传》）。各种势力激烈争斗，互相残杀，终于导致董卓入洛，群雄并起，三国分裂。本文中“阉竖”系指宦官。“愆”与“愆”通，又为乱，《诗经·大雅·召曼》：“我相此邦，无不愆止。”“母后”，指诸朝皇后与太后。“裂幅”，指分割国土。“函、雒”，为函谷关、洛阳之简称，在此代表近在天子脚下的京城地区。“垒”，即军壁，军营所处，筑土自卫，谓之垒，这里比喻敌军。这几句都是描述佛教始入中国后不久东汉政局的衰败状况。

⑭《神经》：即《神异经》之略称。原题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隋志所载亦同。但是刘向《七略》不载，故当为六朝文士所假托。所载诸事多荒唐无稽，不可究诘，然而词华绚丽，词赋家多引用之。

⑮真如：梵文 Tathatā 或 Bhūtatathatā 之意译。“真”，即真实；“如”，即如常；诸法之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云“真”；常住而不变不改，故云“如”。意为事物的真实状况、真实性质。早期佛经中译为“本无”；后世各宗派分别称之为性空、无为、实相、法界、法性、实际、真实、真性、佛性、法身等。其基本概念相同，通常释为绝对不变的“永恒真理”或本体。

⑯《后汉书·西域传》载云：“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恶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乃止。”这即是关于甘英徒然望西海而兴叹，大秦之使终归失败的前因后果。本文“眷”字，反顾之貌，《诗经·小雅·大东》：“眷言顾之，潸言出涕。”

⑰据德国学者夏德考证：这里的“安息”即是帕提亚国（Parthia），相当于今伊朗；“条支”即卡尔提阿（Chaldea），相当于今濒临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

“大秦”即罗马帝国东境，主要是指叙利亚；“大海”即“西海”，也就是波斯湾（见夏德《全录》，42, 45, 47 等页）。然而，在汉文古籍中，“西海”所指极为广泛。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概括道，前汉时代青海名为西海；至张骞使西域，则里海、波斯湾均称西海；后汉时代又称印度洋为西海；至于唐代，杜环《经行记》称地中海为西海（见白鸟《研究（下）》，276—277 页）。故“西海”并非专称，不可拘泥于此。本文“眷西海而咨嗟”一语固然使用了甘英大秦之使失败的典故，但是由于作者旨在讥讽隋朝，所以实际上只是泛指了隋代未能交通绝域的事实。

⑩《后汉书·西域传》云：“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本文为与上句对仗而用“东离”一名，并非特指此国。

“杆轴”：亦作杆轴。原为织具，杆以持纬，轴以受经，《诗经·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杆轴其空。”杆与抒，舒适；“杆情”为舒宜情思之意，故“杆轴”可引申为“怀念”。

⑪玉门：即玉门关，也称玉关，西汉武帝时所置。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小方盘城。关城方形如盘，北、西两面有门，北门外不及百米即疏勒河。六朝时，自今安西通哈密一道日见重要，关址遂东移至今安西双塔堡附近。这是古代通西域的要道。西汉时大将霍去病破走月氏，开玉门关，交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约当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不克，大军被阻玉门关外；东汉班超曾上书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隋炀帝曾遣薛世雄等出玉门关，击伊吾；后裴矩亦西至玉门关，晓喻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中原。所以本文有“扬旌玉门之表，信亦多人”之语。

⑫葱岭：主要指今帕米尔高原。这一高地号称“世界屋脊”，大部分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另一部分则在新疆、查谟和克什米尔、印度、阿富汗的交界处。它的许多山峰均在 6000 米以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最高峰共产主义峰达 7495 米；中国境内的最高峰公格尔峰则达 7719 米。由此向四方延伸出巨大的山脉：天山山脉伸向北方，昆仑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伸向东方，兴都库什山脉伸向西方。古代中原地区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的交通往来，往往取道葱岭；但是它严寒高峻，不易通过，故本文谓隋代“利涉葱岭之源（者），盖无足纪。”

⑬雪山：一称大雪山，通常用以指称今喜马拉雅山；但在本书中则多指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该山脉自帕米尔高原向西南延伸而成，以东北至西南的方向斜贯今阿富汗，长约 960 公里，是伊朗高原与南亚次大陆分界处的大山脉。其最高峰提里奇米尔峰（Tirich Mir）达 7699 米，兴都库什山将阿姆河水域与喀布尔河水域分隔在其两麓。据说其名出自波斯语，义为“杀死印度人的”；因为此山高而酷寒，常年居住在炎热地区的印度人在翻越时不胜其寒，往往冻死，故名。本书中，此山也称为“黑岭”，见序言部分，§ 3.5，注③。